



政治·教育·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

Politics Education and Society
(三)

林家有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教育·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
林家有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7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林家有主编)
ISBN 7-80696-055-4

I.政... II.林... III.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近代 IV.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305 号

政治·教育·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

林家有/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张 22.8 插页 2 字数 300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96-055-4

定价:37.00 元

总序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是广州中山大学“985”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重点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政治是一个涵义广泛、内容复杂的概念。本课题将政治作广义的论述，研究视野拓展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对外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将政治与社会结合起来，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进步、政治与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治国理论、方针、手段造成的社会影响，做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试图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新的探索，用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和文明的程度来衡量与评论政治思想、主张和政治人物施政的正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近代中国政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架构下形成的。以资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方，掌握中国的统治权；以广大的爱国、革命的人民大众和追求进步、追赶时代潮流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为另一方。两方代表着中国的两种社会势力，反映近代中国的两种前途，他们的政治理念、思想，以及改革中国的主张制约着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向。近代中国政治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中





心内容和基础背景。现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里,国家的权力中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使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以往中国近现代史在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和显著突破,但是也有不足,比如控制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枢纽——政治变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更迫切研究的需要和更高的要求;研究重心有从社会各面向中心回归的发展趋势和从具体研究向整体把握提高的客观要求。既往的政治史研究,着重于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单向性地解释政治变迁给社会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理论的提高。本课题把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为基本切入点,在既有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富于创见和有时代特征的宏观阐释系统,以观察视野的拓展和研究层面的深入为主导,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和方法的创新,提升研究水平,开辟新的路径。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整体上看,过去的研究兼具成果数量多而缺陷严重的双重特点,可以进一步开发的空間仍然较大。我们中山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和优势,在孙中山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列,讲求学术规范,长期以来形成求实求真的精神和相互协作的学术风气,在多个方面颇具潜力。参与“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课题研究的有老一辈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博士后研究者,其余均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研究班子,各人就其兴趣和研究所得进行新探索;不少论著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的良好评价,经过反复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示人的作品。他们围绕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视野和不同角度进行的专题研究各

有特色、各有优长,具有前瞻性和学术性。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丛书,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希望这些成果能对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所帮助与启迪。当然,我们更期望读者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得知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之后,慨然应允,表示将以最快的速度 and 高质量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我们除了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外,也对他们为出版学术著作、传播精神文明的精神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钦佩。

林家有

2003年11月于广州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Preface



总
序



目 录

第一编 孙中山建国理念的考察	1
第一章 看清世界,摆正位置	
——孙中山的世界观与全球意识	2
一、为了中国,了解世界	4
二、文明共享,共同发展	13
三、国与国相交,必须平等互惠	21
第二章 独立自主,和平友好	
——孙中山的对外政策与和平理想	31
一、独立的外交思想和平等的对外政策	31
二、为实现“天下为公”和平理想而奋斗	45
第三章 为共和而奋斗	
——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新探	62
一、大中华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内涵	62



	二、整合民族意识的目的和意义	81
第四章	为富强而奋斗	
	——建设广东“模范省”的主张	96
	一、只有政治好,才能有效地进行建设	96
	二、只有经济好,国家才会富强	104
	三、只有教育发展,强国才有可能	117
第二编	政治与教育	
	——近代中国政治对教育的影响	124
第一章	中国传统教育与社会的悖离	127
	一、科举制度的危机	127
	二、科学制度的废除与近代教育的起始	134
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142
	一、辛亥革命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142
	二、民初新教育方针的争论	152
	三、民初中国教育的发展	159
第三章	变法与变人	
	——康有为的人才观和教育改革思想	169
	一、为了变法,要求变人	171
	二、为了培养变法人才,倡导教育改造	184
	三、回归传统,尊孔重儒	187
第四章	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	
	——梁启超的“新民”教育观和精神价值	199
	一、社会转型对人才的渴求	200

二、教育改造的目的在于树立“新民”的观念	206
三、教育改造“以人为本”	214
第五章 社会变化与近代教育变革	
——严复的国民教育思想	219
一、“鼓民力”——尚武强国思想的发扬	220
二、“开民智”——国民素质的提高	224
三、“新民德”——新伦理道德观的确立	232
四、改学制——学贯中西人才的培养	238
第六章 政治教育与弘扬革命精神	
——孙中山的人才观与教育理念	245
一、孙中山的人才观和兴学主张	247
二、救国与救民	
——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看他的教育理念	262
三、“博学”与“笃行”	
——从孙中山创建广东大学,看他的育才思想	282
第七章 政党教育与教育独立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	295
一、教育与革命相结合	295
二、领导北京大学而驰名中外	300
三、支持“教育独立”的呼声	307
第八章 “全盘西化”与教育现代化	
——陈序经的文化教育思想	316
一、“全盘西化”思想悖论	316



二、“全盘西化”与教育现代化主张	326
第三编 近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以广东为中心进行考察	336
第一章 18 世纪澳门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	337
一、18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澳门	337
二、澳门优势失落的原因及其影响	343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功利思想与务实精神	354
一、张之洞的功利思想及其影响	354
二、张之洞的务实精神——广东治水	367
第三章 文化与人物	
——广东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的文化因缘	382
一、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382
二、岭南人文环境与文化特征	387
三、广东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的历史原因	395
后 记	401



第三编 近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变迁

——以广东为中心进行考察



近现代的广东是一个得风气之先,人才辈出的地方。在中西文化汇、碰撞和交流、吸纳的过程中,造就了广东人的特殊性格,他们既热爱桑梓、眷恋家乡,具有强烈的反抗侵略、保卫家园的深沉意识;又有敢为天下先、闯荡世界的勇气。近现代广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本章拟通过对澳门自18世纪以来特殊地位的失落及其影响,以及两广总督张之洞功利思想和务实精神的探索,说明广东近代化事业的启动。广东的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内外因素,但由于当时国家当权者政策的失误,以及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改变了广东,使广东由中外贸易、文化交往的基地和窗口变为革命的发源地。通过对澳门、对广州的历史变迁的陈述,对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研究,说明社会的变迁,有文化的因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观念的原因,但重要的是人的因素,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社会变迁以人的“变迁”为本,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真理。



第一章 18 世纪澳门的特殊地位 及其影响

一、18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澳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在他主编的《18 世纪中国与世界》丛书“导言卷”中说：18 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而诞生。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震撼和改变了世界。世界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进。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开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然而，当时的中国虽号称康雍乾盛世，但中国社会已经落后于西方，中国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①。这话怎么理解，我以为，从 18 世纪以来的二三百年，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澳大利亚先后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学者指出：“十五六世纪为葡萄牙、西班牙时代，

^①戴逸著：《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 页。



16 世纪下半叶、17 世纪上半叶为荷兰时代,18 世纪为英国时代”。^①但是中国并没有能够把握时机,通过政治改革和产业革命,建立起新的经济、政治体制,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所以中国落后了。

中国近代化起始于何时?如果说,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么中国的近代化起于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但从资本主义的萌芽来看,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明清时期^②。近代化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全球性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最伟大的变革,是社会变迁的系统工程,是由传统的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转换过程。它包括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等许多方面的高度发展。各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结、相互推动,同步前进。用单一的标准不可能对社会近代化程度做出正确评价。虽说近代化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化,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西化”。因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近代化经历的道路和所用的方法也有异^③。中国近代化是非常复杂曲折的过程,这除了侵略者、掠夺者造成不利和严峻的国际环境外,与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国人未能走向世界,未能树立新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也有关系。

①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 页。

②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何谓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是什么?学术界提出过许多带有启导性的意见,看法虽未能一致,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这个萌芽没有顺利发育成为资本主义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现在人们对资本主义萌芽论持有异议,谈论的人也少了,但从近代化的理论看,“萌芽论”不见得错,在封建社会内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说如果条件允许封建社会也会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下),巴蜀书社 1987 年版。

③参见戴逸著:《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 6~8 页;林家有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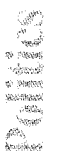
近代化既然是一种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人类追求的一种理念和理想,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它走向近代化的时候都要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不了解世界也就无法深刻了解本国本民族,只有吸收世界民族的先进文明。才能使本国本民族与世界民族拉近距离,才能产生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理念,才会有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其名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说:“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的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①严格说来,直到18世纪中国人还没有世界概念,没有世界的知识,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英国、美国、葡萄牙在何地,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更谈不上有什么世界观念、全球意识了。

中国人有悠久的文明,众多的民族和幅员辽阔的土地容易产生自高自大自满的心态,所以在16世纪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创造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时候,中国仍然在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下,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固守着传统的农业经济。从明末到19世纪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潮流,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到了18世纪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它不需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实行闭关自守,把中国以外的各国都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民”,根本不想了解也不想知道外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正因如此,直至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主持修撰的《广东通志》还将“亚米利加(今美洲)”,说成是“即亚美利加(今非洲)”,将“加那英吉利(今加拿大),米利坚等国”,说是“皆[属]利未亚(今非

①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清高宗圣训》,卷26。



洲)也”^①。把当时称呼非洲的名字“利未亚”和非洲全称“亚非利加”当作两个地名,而又把“亚米利加”和“亚非利加”当作一个地方。连学识广博,负责总纂《粤海关志》的梁廷枬也信以为真,说“若加那英吉利(即加拿大),若米利坚,则利未亚之地也”^②。当时全国惟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对世界的了解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至鸦片战争爆发,清朝上下对发动侵略的英国的情况还一无所知,直至战争结束时,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的面积有多大,所属国有多少,英国到新疆有无旱路可通。就是被清朝指派到广东严禁鸦片,督率军队抗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奏折中也承认:“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不知其来历。”^③在这种情况下的中国,不仅不能与世界的发展潮流同步,更难以抵御列强国家的侵略,这就铸成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曲折和缓慢。诚如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所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不堪一至。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④

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和珠海市)。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澳门成为我国对东南亚各国番舶贸易的港口之一。葡萄牙人自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租借了澳门后^⑤,葡人开

①阮元编撰:《广东通志》,卷330,列传63按语,194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册本,第五册,第5661页。

②梁廷枬撰:《粤海关志》(清·道光年间刻本),卷24《市舶》按语。

③参见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④转引自郭成康等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自序”,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⑤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学术界看法不一,可参见戴裔煊著:《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黄启臣著:《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5页;邓开颂,黄启臣编:《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11页。



始在澳门长期居住和经营贸易,至明朝末年的数十年间,澳门迅速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西欧国家在东方进行国际贸易的中转港和互埠市,在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其所著《广东新语》书中对澳门有这样的描述: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濠镜为澳。濠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棲诸澳悉废,而濠镜独为舶藪。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岭如莲茎,踰岭而南,至澳门则为莲叶,岭甚危峻,稍不戒,颠附崖下。即踰岭,遥见海天无际,岛屿浮青,有白屋数十间在烟雾中,斯则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关,关外有番人百余家。^①

澳门居珠江口西岸,东与香港隔海相望,西与珠海湾仔一衣带水,南临南海,北连珠海拱北。澳门半岛三面临海而以诸岛为屏障,既适宜船只停泊,装卸货物,又便于海外航行。澳门亦名濠镜,其南有四山壁立海中,纵横交贯如十字,故土人呼之曰十字门^②。

1508年明朝政府在广州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为防沿海倭寇之患,曾迁移于广东电白县。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市舶司由电白县迁移至濠镜,允许外国商船入泊濠镜,澳门便成为中外商人互市之地。暹罗、占城、爪哇、渤泥诸国^③,均来此贸易。这样,靠近广州,

^①屈大均撰:《广东新语》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页。

^②《澳门考略》。《申报》1887年3月13日。

^③《澳门通商史》。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位于华南沿海出口处而又交通便利的澳门，便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①。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澳门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籍人士居留者便日多。据《澳门纪略》载：

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阳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外环大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贡，附近货物，照例抽盘，其余蕃商贾私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分之二，乃听贸易。每年夏秋间，夷船乘风而至，只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化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以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矣。^②

由此可见，明朝市舶司迁移澳门后，澳门发展迅速，各国商人商船云集，对于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均起重要作用。到了18世纪康熙、乾隆时期澳门对外贸易尽管呈现衰微开始走下坡路，但它的特殊地位未失。

16世纪以后，世界各地经济逐渐建立起较为持续性联系，中国位于亚洲经济圈，农业和手工业的海外贸易十分活跃。随着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新航线，中国与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为中国明朝的对外贸易奠定了基础。可是正当中国民间海外贸易有可能突破传统模式时，明朝廷则因怕葡萄牙、日本等国势力的东来，于嘉靖年间重新颁布海禁政策，对外贸易严加控制，甚至关闭了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这种短视的行为和失误，不仅使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受阻，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与世界隔绝。嘉靖末年，在沿海地方官员

①刘子健、叶文益主编：《澳门归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第23页；参见《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12页。



的奏请下,明朝廷于1567年(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民间海外贸易有所回升,但由于中国历史的更进,王朝的兴废,终于破坏了原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清初严厉的海禁政策,使澳门等东南沿海地区正常的海外贸易都中止了,使明后期兴起的中国商品经济往后倒退了许多。康熙年间海禁的解除,虽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但随后清政府又颁布以“防范外夷”为宗旨的海洋政策,限制本国出洋贸易或寓居海外,严禁中国人走向世界,其实就是将中国禁锢在封建的保守的经济圈和生活圈里,其结局便是经济落后,国民愚昧无知,失去了与别国竞争的能力^①。

二、澳门优势失落的原因及其影响

有清一代,清政府对外政策反复无常,时而开放,时而海禁,澳门的对外贸易也时起时落,正如黄启臣教授在其专著《澳门历史》一书中所言:康熙皇帝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废除海禁,直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的156年中,澳门的外国商船纷至沓来贸易。可是后来葡萄牙人为了垄断自明代独占澳门对外贸易的传统,违反粤海关的规定,禁止其他外国商船停泊澳门。到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后,葡萄牙以外的商船再不入澳门,而驶往黄埔碇泊,到1724年(雍正二年)终成定例。黄埔取代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而澳门则成为孤岛,失去其对外贸易的优势^②。随着澳门作为对外贸易港口优势的失落,从16世纪以来葡萄牙耶稣会士伯来笃(MoLchior Nunez Barreto)和耶稣会士公匠勒

①吴建雍:《康乾盛世时期的中西贸易》。《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第343~406页。

②关于澳门在康熙至道光年间对外贸易的起落情况,可参见黄启臣著:《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印,第105~121页。